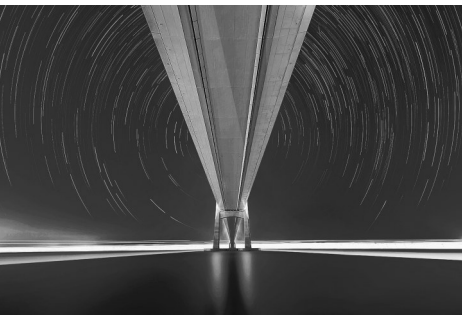


奇迹人文

无过无不及：德行是中庸的前提

张培水



关于人格塑造，儒家有一个核心词“中庸”，是由孔子首创，子思、孟子着力阐发，南宋朱熹又把《中庸》定为《四书》之一。千百年来，儒家围绕中庸做足了文章。儒家以中为本，以中为常、以中为用，对人从思想上洗礼、从行为上规范，构建出“人之为入”的品格框架，展现出儒家的理想人格。

孔子没有告诉人们中庸是什么，却提醒最应关注它的道德属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是常道，似乎人人可用，但未必是孔子倡导的中庸。一旦失去德行这个前提，中庸就会变质、变味，背离了初衷而走向反面。

孔子还说“乡愿德之贼也”，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才是道德的破坏者。孔子不赞同无原则、无道德的“用中”，绝不欣赏墙头草、和事佬、骑墙派、伪君子，更不会教人圆滑世故、四面讨好、八面玲珑、见风使舵。在公共生活领域，以道德为前提、以中为根本、以和为目的的中道、中行、中节，才符合中庸的本意。

“中庸”之“中”最不可忽视。在甲骨文里，“中”是一个椭圆形加中间一竖，金文是方形加中间一竖，本意都指向中间、中心，蕴含着公允、中正之意。《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稍加延伸，“中”是天下的根本，自然也是国家的根本，家庭的根本，做人的根本。

孔子没有给出中庸的定义，却举出非常鲜明的例子，“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过于偏激，而子夏又过于保守，都没达到恰好的标准。不难推断，无过无不及就是孔子倡导的中庸。二程、朱熹顺着这一思路，继续讲“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二程以走路为喻，不左不右，走在中间就是中，常走在路中间就是中庸。朱熹突出强调的是庸——常也，认为平常生活中，一个人办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时时事事守中、处中。

当然，孔子这一思想其来有自，《论语·尧曰》篇，明确记载尧舜禹相传相授的箴言只有四个字——允执其中。“执中”便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自然也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所在。

中庸既然是德行，自然源于“仁”，仁统摄诸德。但不是所有的仁都是中庸，仁德之至才是至德，才是中庸。换言之，仁让我们有爱，而中庸让我们会爱，并且恰如其分。

中庸是大德行，也是大智慧，还是一种哲学思维。正是因为中庸，孔子的仁学思想才有了灵魂和高度。《中庸》名言“万物相育不相害”，世界万物各不相同，相互生长并不相互残害，这是儒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

人际关系中，儒家不认同敌对的、仇视的、非黑即白的、勾心斗角的、你死我活的，而承认多元、不同与差别，承认矛盾，但这一切又是可以调和化解的，最终达到双赢、共赢的理想结果。

因而《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一要高，站的高，境界高，井底之蛙就不高；二要明，明白的明，不要糊里糊涂，生活和懂得生活不同，做事和懂得做事不同，只有达到极高

明的境界，才能践行中庸。

生而为人，有各种欲与求，这是自然天生的，但人又是社会中人，所有的欲与求，都必须合乎“中”的原则。涂又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讲一个字是“和”，讲两个字是“中和”，讲三个字是“致中和”。

“和”强调保留差异、差别的和谐相处。我们常以“中”通向儒家的最终理想——“和”，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修炼中庸需要很高的修养、智慧和勇气，要掌控情绪，理性思考，进者抑之，退者举之，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要与时俱进，在变化中把握变化、恒常与和谐。

孟子称赞孔子是“时之圣也”，时时以中庸为思想方法、行事准则的圣人。的确，“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思想上，孔子没有别人常犯的四种毛病，即不凭空猜想，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

思路决定出路，孔子能行中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在人已关系上的中庸；“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他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中庸；“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他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庸；“欲速则不达”，体现他在速度和结果之间的中庸；“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是他教育学生的中庸；“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是他对待朋友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是他对鬼神的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他审美的中庸；“温故而知新”，是他继承上的中庸。甚至生活中“唯酒无量不及乱”，酒量好但不喝醉，这也是中庸。可以说，中庸已经渗透到孔子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并且使他的视听言动、举手投足，无不处于一种很理想的状态。能不能“处中”“守中”，大约就是我们和圣人

之间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标准的“中”，并不总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则，“中”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孔子称之为“权”，孟子称之为“时中”，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最应该做得就是顺势而为。

孟子曾讲“嫂溺，援之以手”，尽管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但若嫂子落水，就应该拉她一把，不这样做，孟子斥之为“禽兽也”。所以，有时看是打破一种规则，反而是对规则的最好维护，保持了规则的弹性，还原了制定规则的本真，求得一种动态平衡，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和谐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奉行中庸之道，不可忘记孔子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概括地说明了为人处世的方法，不但适用于人际关系，而且适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有了这样的心，人们不会践踏或滥用一草一木，自爱而且爱人，自尊而且尊人，不偏激、不偏心、不偏向、不自私、不自是、不保守、不颓废，超脱而又丰盈地活着。所以，中庸之道适用于日用伦常，千古不变。

■本版摄影 粤梅



创胆琴心

一缕茶韵尘梦十年

张荣贵

我生在武夷，喝茶半生，奈何异乡漂泊为异客，劳生浮梦事匆匆。少有清闲品茗的时候，也总是难于忘怀武夷茶的醇味厚韵。每每匆匆喝茶，总会想起武夷的茶韵来。

自唐代陆羽《茶经》问世，茶就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建阳区域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茶是唐代孙樵《送茶蕉荆部书》所记的“晚甘侯”。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日与僧道异人往返。每至冬时，即溪冰敲精盏煮建茗，共宾客饮之”。

建阳最早的官办茶局——玉茸轩，也于南唐保大元年（943）应运而生，至宋时，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梅尧臣等名流诗文的颂扬，使得建茶即武夷茶更是名噪一时，如黄庭坚诗“平生心赏建溪春，一邱风味极可人”，与梅尧臣诗比来唯建溪团片故汤并。

武夷的茶自宋至清都是名列贡品，到清道光引进红茶制法后，就已经具备了绿、青、红、白四大茶类。往事越千年，如今武夷山中的名丛如大红袍、白鸡冠、曲奇等，都是茶中的极品。武夷山依然有着元代御茶园遗址，流香涧、天心岩的正岩乌龙，以及“正山小种”正令人口齿含香，传颂不已。

选茶，我更钟情于正统武夷红茶“正山小种”。清道光后，这种茶就自然地生于我家乡的深山涧边，自纳山川雾露之灵气。

每过清明，茶叶便要举行隆重的开山仪式，以祈茶神庇佑茶农。随后采茶的少男少女，总是提着茶篮，唱起多情的采茶山歌，既收获着茶叶，也播撒着爱情。那份山野茶地独有的烂漫，没有亲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鲜茶下山，经萎凋、搓揉，然后堆起发酵，再烧松柏木烘干，便成了黑色的正山小种。每一道工序都那样有讲究，这些是全凭茶师手、脚、眼、鼻的丰富经验的。冲泡起来，茶汤红润得已令人陶醉，茶气的清香，弥漫到令人如痴如醉。只要你品上一口，那略带龙眼味，又泛出松柏气，醇和得连骨头也酥了，能回味一生一世。

古往今来，品茶品出的，岂止是感官的享受，浸淫其中，才能琢磨出中国茶文化所推崇的廉、美、和、敬之哲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身处清幽的茶室，面对精致的茶具，馨人心脾的茶香，红润而清澈的茶汤，细细品上一口，那份清香甜中透出淡淡的清润滋味，淡淡的甘苦交融，淡淡的醇和隽永。斯时斯境，会油然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袭上心头，而无需眼下茶馆的丝丝竹竹耳耳。

每每身心俱疲，会想到武夷的茶，想到武夷的正山小种，它的厚韵，品出的仿佛一段人生，一段足够回念的平和、平淡、平实的人生。在那份茶韵荡漾着俗念时，我想，这就是苦茶庵主所道的“可抵十年尘梦罢”。



窗，古人分得很细，根据所处位置不同，分别称为窗、牖、向等，现代人统称为窗。它作为房屋的一部分，打通与大自然的隔膜，将日月星辰、山光水色引入室内，带来光明和新风，更带来情趣和美的享受。

相比现代居室宽敞明亮的窗，我更喜欢古人的窗。在外旅游，每到一处古镇，面对一幢幢古建筑的窗，可以胡乱猜想窗内曾经的悲欢离合，更可以凝望、打量形形色色的窗，而叹为观止。

古人造窗，不仅在乎窗子的实用功能，更在意窗子的美学价值。

窗的形状或圆或方或扇形，窗格极尽纵横、欹斜、屈曲之变化，再雕以梅花、石榴等图

智慧本是一份善良。世人都讲智慧，不过，人总是俗人，常把智慧用到歪门斜道上。

算计人、糊弄人、败坏人，这都是需要“智慧”的。

没智慧的人，只能是被算计、被糊弄、被败坏，甚至因为没有智慧，连被算计、被糊弄、被败坏都不用了。

庄稼人骂精明人，不用多粗鲁，一句“一肚子坏水”就够了。这个“坏水”，不是“智慧”

诗 词歌赋

徜徉宋词觅清凉

包羽鸣

时已立秋，天气依旧地燥热。常与友人戏言，空调、无线上网，西瓜是“夏日三宝”。想起《梦华录》热播，不免疑惑，遥远的宋代没有“夏日三宝”，时人要如何消暑纳凉？徜徉于宋人留下的诗词中，或许可以窥得宋时的夏日。

宋人的清凉在碗里，食人口中的凉爽自然最为痛快。朝廷保留以往赐冰的惯例，寻常市民也可以享用到消夏的冰块了。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荔枝歌》中就有体现：“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

利用冰块，最简单的就是冰镇水果，李重元在《忆王孙·夏词》中写道：“过雨荷花满院香。浅香浮瓜冰雪凉”，水果浸于冷水中，取出来食用清凉可也。

宋人刘学箕的诗中也有：“房青子碧甘剥鲜，藕白茶翠冰堆盆。嚼之清冷醒醉魂，犹可招邀慰园园”。

除了冰镇水果，宋人还制作出了冰镇甜品。杨万里曾写诗大赞一种名为“冰酪”的冷饮：“似酥还成爽，才凝又欲融。玉米盘底碎，雪到口还销”。冰酪由果汁、牛奶、冰块调制而成，类似于今天的“冰淇淋”。

岁 月 霓 裳

窗之美，于视界与襟怀

洪德斌

案，贴上红色的窗花、洁白的窗纸，造型丰富、色彩鲜明、精致优美。

难怪古人又把窗称作绮窗、朱窗、雕窗、轩窗，想想这些名字，就已觉美感漫溢。这还不够，窗前再搭配几块奇石、数竿翠竹，窗后饰以半卷帘栊，柔曼飘逸，咫尺之间更是惹人怜爱，风情万种。

窗不仅本身如画，也再度呈现一幅幅画卷，古人说，窗之妙“莫妙于借景”。立于窗前，放眼望去，日出日落，云卷云舒，视野倍感开阔，心情顿觉舒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窗前远岫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窗就是一个个画框，裁剪出的画卷美得让人心醉。

清代李渔似乎对窗情有独钟，曾别出心裁设计“梅窗”。以梅花作窗，俨然绘于墙上的梅花图，自诩为生平第一佳作。这还不够，因为窗是固定的，呈现的画卷少有变化。他在《闲情偶寄》中写道，曾居西湖之畔，欲购一小船，船篷四面用木板遮严，唯左右两边各开一扇形窗，人坐于船中，船行湖上，凭窗望出去，皆是流动的天然图画，“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

新 格 言

智慧是把双刃剑

杨福成

吗？不光是“智慧”，还是“大智慧”，只不过把智慧玷污了，也把自己的良心搞拉杂了。

女”“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这游走之窗，一日之内，现出百万万幅佳山佳水，变幻无穷。只可惜他囊中羞涩，只得作罢。

窗可以观景，更与人的生活须臾相伴，挥洒人生的意趣。

晋人陶渊明厌倦官场生活，辞官归隐，采菊东篱，种豆南山，悠哉游哉。《晋书》中说他“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炎热的夏日，他躺在窗下，凉风习习，无忧无虑。人是闲的，心也是闲的，闲了，自然能写出那些冲淡的诗句。

清人郑板桥有两间茅屋，窗前植一片翠竹，竹下置一小榻，竹阴乘凉，舒适无比。窗上糊有洁白的纸，不管是白天的风和日丽，还是夜晚的月光皎洁，他喜在窗前休憩，观纷乱竹影在纸上摇曳，犹如天然墨竹图，不禁心有所悟。“凡我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窗给他带来许多乐趣，更让他画艺大增。

观古今文人，喜欢窗者比比皆是，写窗的诗文不计其数，窗的倩影不时在文字中晃动，也在我们的心中晃动。此刻，我正坐于窗下，品窗之美，写窗之美。我觉得，窗是房子的眼睛，也是我们的眼睛，更是我们的胸襟。

佛家好讲智慧，很多语句都很有意思，如“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特别让人开悟。

弘一大师有一副对子——“饮诸佛法海，放大智慧光”，延伸一下，就是“智慧是一份善良的光”。

这一辈子，能掌握多少智慧无所谓，关键是能不能把这些光或这点光放大，让人感觉到彼此间的美好。



此外，北宋时期曾流行瓷枕，其中以定窑产的瓷枕最为有名。“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枕面上釉，头枕瓷枕小憩自然凉爽非常。

宋人的清凉在心头。如果消暑也有境界之分，那么，最高境界非“心静自然凉”莫属。散去热气全靠心中安静，凉风生起因为室内空荡。

宋人温革的《琐碎集》中说：“避暑有妙法，不在泉石间。宁心无一事，便是清凉山”。以“坐静”而摒弃杂念，心生清凉。陆游也说：“暑用酒逃犹有待，热凭静胜更无方。空斋一榻偶然卧，闲看衣篝起篆香”。消暑的最高境界，不在外物，而在心中。

《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夏日汴梁：“风亭水榭，峻宇高楼，雪槛冰盘，浮瓜沉李，流杯曲沼，苞鲜新荷，远近笙歌，通夕而罢”。坐享冰盘冷饮，沿溪斟酒传杯，聆听笙歌悠扬，通宵才愿离去。

炎炎夏日，宋人的清凉在碗中冰镇小食，在手中香扇瓷枕，在心中沉静思想。碗中美食，手中好物，心中境界，连带宋代风华，夏日情景，绰约多姿，都付诗词中。

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的烧制，缘起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这似乎已成共识。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德国传教士奔德在龙泉购地垦种时发现古瓷，龙泉青瓷名声初显。

日本、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收罗青瓷，例如宣统二年（1910），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村民合作挖掘，此后长达十余年。

国内大批古董商也接踵而来，加之民国初期知事杨毓琦抛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墓墓园，并亲往巡视，导致大量古窑址、古墓葬被盗挖一空。

古瓷大都行销沪上等大都市，富贵之家耗费巨资购置正品以示身价，普通人则买个次品或仿品把玩以充风雅。古瓷丰厚的利润，驱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研制仿烧古青瓷产品。“邑人廖献忠首谋仿古，几可乱真，是为近代仿古之嚆矢……”民国龙泉县长徐渊若，在专著《哥窑与弟窑》中这样定论。“廖为逸清秀才，试列第一，戚友谏者，赠匾以贺，文曰‘独占鳌头’”。

才华横溢的廖献忠，却因脚癩堵死了仕进的通道，加之身世寒微，他不得不为生计奔忙。光绪二十八年（1902），廖献忠与叶梅吴并兰至大窑，发动村民在叶梅吴家采掘出一种钢筋炉，由吴并兰购去。

之后，廖献忠又频频到大窑古窑址，寻找历代青瓷残片，在自家作坊反复实验，还曾在龙泉巨商赵道生于城区桃源山上修建的龙窑中烧制仿弟窑型器皿，终于获得青瓷釉料配方和烧制技艺。

廖献忠仿制的古瓷，无论是“晶莹之色”还是“绿翠之形”，都可乱真，一时名闻遐迩，却因此陷入一场官司。

1918年，龙泉县大通和银行当手（经理人）季克明，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了县公署，称大沙张锡妹、城东张水清先后将5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古瓷，哄骗季克明以250元全数买下，后季克明察觉是假货，无法转售，于是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艺人廖献忠串通诈骗。

性格耿介的廖献忠，在应诉状中自陈虽然生活窘迫，却安贫乐道。仿制大窑古瓷是为谋生所迫，但明仿明卖，并无欺诈。后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业厅分别签署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护。

最后，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缴瓷器。廖献忠以“瓷被更换”为由，不愿领回，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在《龙泉访古记》中谈及龙泉仿古青瓷时，则另持一说：“据说溪头李某最好，竟可乱真。八都之刘马德亦在溪头烧过，廖氏尚在其次”。这个李某是谁，却语焉不详。

据《龙泉民国档案辑要》书记载，1943年，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君义、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龚庆芳、许家溪等制瓷高手，在溪头组织仿古青瓷研制小组。凭此推断，李某当指李君义。其实，我们更应关注仿古青瓷研究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陈佐汉。

陈佐汉早年追随朱庆澜将军、严宽将军北上抗敌，年仅二十几岁就担任上尉军需一职。因为一封“母亲重病速回”的家信，难违母命，退役返乡。

在宝溪乡乡长任上，陈佐汉召集当地制瓷高手，开展仿古青瓷的研究，庇护这些人免于被抓去当壮丁服兵役，这也得到了县长徐渊若的默许，《哥窑与弟窑》中记载了此事：“宝溪乡龚庆芳兄弟以及张高礼、张高乐等六人，以仿古著名，其制品甚精致。曾以恢复固有艺术，系属专门技术人员为词，申请缓招。余亦恐邑人仿古名手，日趋凋零，颇有同情之意，为请于上峰，奉批格于条例，碍难照准。今日已否从戎，尚未探知”。几人的名字有所出入，有待考证。

仿制古青瓷的场所，就设在溪头村陈家大院的前厅，置有相关设备。陈佐汉聘请的仿制青瓷的主要技师是张照坤、李怀川，后又从云和请来雕塑技师彭益陶，专做仿古青瓷器型的雕塑。另腾出自家的一间旧房，略加修整，命名为“古欢室”，作用近似如今的研究室。联云“翰墨随缘拟古欢”，古欢室的取名，或许从中得到启示。

陈佐汉仿制的古青瓷，种类繁多，大抵有凤耳瓶、云鹤盆、双鱼盘、金色缸、双鱼洗、双鱼碟、鸳鸯洗、牡丹瓶、高脚、鱼篓瓶、印盒、龙虎瓶、桃洗、五嘴瓶、观音佛像等数十种。

徐渊若盛赞：“陈佐汉氏等所制仿铁骨，有时颇可混珠，若用药去其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敲碎米许，则好古者易于上钩”。1945年，陈佐汉收集了宝溪乡几家瓷厂七十余件仿弟窑牡丹瓶、凤耳瓶等优质瓷器，委托徐渊若邮寄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旨在展示仿古青瓷之成果，期盼各级政府给予重视及资金上的支持。正逢蒋介石六十大寿，其作品果受蒋青睐，亲笔题词“艺精陶仿”四字勉励。

仿古青瓷“绝精妙”，常人很难识破。即便学识渊博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哥窑与弟窑》中记录了一些桩趣事：龙泉的古物商吴子忠，受战时寓居龙泉的知名瓷器鉴赏家金石寿指点，仿制的古陶器纹款色泽，唯唯逼真。曾仿晋代式样，制成陶器数件，至浙大龙泉分校（址在芳野曾家大屋）求售。各教授见之其古趣盎然，纷纷考证年代，度量分寸，辩论款式，交口赞誉，顷刻售罄……一时被传为笑谈。

仿古青瓷的烧制颇为不易，“出窑时烧损极多，甚有全窑毁坏，什中得成六七，已属大幸……”花费精力和代价之大，个中滋味旁人难以体会。所以众多仿古能手，对制瓷原料、釉色这些独门技艺，都严守秘密，从不轻易透露。

日本人也会有仿龙泉的作品叫七官手，沪上称为老东洋，以鼎炉等式样为多，所仿钢筋炉也很可观。其颜色将颜料掺入釉内，不若我国处青釉料之能天然发绿，且略带黄色，质轻，火度不高，击之无声，露胎处发灰色，一望可辨。

可见，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精髓，外人是很难掌握的。

传 奇

惊心动魄的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秘史

陈 小 龙